

谈谈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

——读李嘉图《论对外贸易》有感

华 舫 振

《论对外贸易》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的一章，内容非常丰富。他在这一章中提出的“比较成本说”，不仅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对外贸易有积极作用，就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对外贸易也有借鉴之处。当然，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在理论上还存在一些严重的缺陷，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时期，西欧国家的对外贸易实行的是重商主义理论和政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这些国家的对外贸易理论和政策，逐渐从重商主义转到了自由贸易。为了适应这种转变的需要，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地域分工论”。他认为，各个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基础在于实行地域分工，因为各个国家先天所拥有的地理自然条件和后天所获得的生产条件都不一样，如果各国都根据自己最有利的条件，生产成本比别国绝对低的商品，进行国际交换，这对各国都是有利的。由于他强调要生产成本绝对低的商品才能进行国际交换，所以这一理论又被称作“绝对成本说”。①

亚当·斯密的“地域分工论”对当时国际贸易的发展是起过促进作用的，但是，实行他的理论也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各国的生产发展水平不一，很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国家，生产不出成本绝对低的商品，是不是就不能参加国际贸易呢？事实并非如此。后来，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地域分工论”，提出一个“比较成本说”，认为各国只要能生产出成本相对低的商品，就可以进行国际贸易，并使贸易双方都能得到好处。

李嘉图说：“一般说来，在同一国家内，利润总处在同一水平上”，“但在不同国家间情形就不如此。”因为在各国之间“有种种因素阻碍着资本移出”。因此，“不可能用一百个英国人的劳动交换八十个英国人的劳动，但却可能用一百个英国人劳动的产品去交换八十个葡萄牙人，六十个俄国人或一百二十个东印度人的劳动产品。”他假设，英国生产一定数量的毛呢需要一百个人劳动一年，生产一定数量的葡萄酒需要一百二十个人劳动一年；而在葡萄牙生产同样数量的葡萄酒只需要八十个人劳动一年，生产同样数量的毛呢只需要九十个人劳动一年。葡萄牙两种商品的劳动生产率都比英国高，但在葡萄酒的生产上却占更大的优势。因此，对葡萄牙来说，与其既生产葡萄酒，又生产毛呢，还不如生产更多的葡萄酒，而用葡萄酒同英国交换毛呢。因为葡萄牙自己生产一定数量的毛呢，需要九十个人劳动一年，而通过对外贸易，则只需要八十个人一年生产的葡萄酒，就可以交换到同样数量的毛呢。这种交换可以为葡萄牙节约十个人一年的劳动，其好处是明显的。从英国来看，虽然用一百个人劳动一年生产的毛呢，只换到别国八十个人劳动一年生产的葡萄酒，可是如果由英国自己生产葡萄酒，则需要一百二十个人劳动一年。这样，通过交换，它也节约了二十个人一年的劳动，

其好处也是明显的。这就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②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阐明了一个道理,即国际分工是节约社会劳动的重要源泉之一,并为开展对外贸易提供了一个“比较利益原则”。就这方面来说,它是符合劳动价值论的,是含有科学的内容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对外贸易》一节中也说过:在国际贸易中,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物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③因此,我认为,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从我国的外贸实践来看,由于我国的劳动生产率较低,生产成本较高等原因,国际市场上的商品价格一般的比我们国内的同类商品价格要低。例如,1978年在国际市场上,上海生产的缝纫机平均每架售47.86美元,约合人民币70多元;自行车平均每辆售41.91美元,约合人民币60多元,都低于国内市场价格。因此,在我思想上一直认为,象我们这样的国家,出口商品是不合算的,只是因为要进口才不得不出口。读了李嘉图的《论对外贸易》,我感到,这种认识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有害的。在国际市场上,一般地说,我国出口的商品价格比国内低,但是进口的商品价格也比国内低。例如,进口的搪瓷铁皮,加上外贸加成、各项费用和税收后,每吨价格仍低于国内的出厂价格。而且我国也有许多成本相对比较低的商品,如各种纺织品、服装、鞋帽、手工艺品,等等。如果我们能多生产这些商品出口,对我国是很有利的。

马克思指出:“一切节省,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省”,**“节省时间以及在各个生产部门中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就成了以集体生产为基础的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是极其高级的规律。”**④我们在对外贸易中,只要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正确运用“比较利益原则”,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克服或避开我们的短处,不断地改进出口商品的结构,就能最大限度地节约社会劳动,使对外贸易活动获得最佳的经济效果,而这正是马克思揭示的节约时间规律所要求的。但是,由于我们过去对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原则”缺乏全面的认识,长期把对外贸易仅仅看作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种调剂、补充手段,对外进行商品交换似乎只是为了取得不同的使用价值,没有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对外贸易对节约社会劳动的重大意义,因而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我国外贸事业的迅速发展。七十年代以来,我国外贸的国内收购额占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3—4%;我国出口贸易总额占世界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还不到1%,这同我国的国际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因此,我们应当很好开展对外贸易的调研工作,找出哪些商品的成本高,哪些商品的成本相对较低,进行比较分析,然后排出哪些商品应大量出口,哪些商品应少出口一些,哪些商品应多进口一些,哪些商品应少进口一些,以便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在外贸工作上主动打进攻战。

上面是从李嘉图“比较成本说”的科学方面来谈的。但是这一理论也存在很大的缺陷和局限性。前面说过,这一理论是符合劳动价值论的,但是在国际市场上,商品的价值量是由什么决定的?为什么葡萄牙耗费八十个人劳动一年生产的葡萄酒能同英国耗费一百个人劳动一年生产的毛呢相交换?李嘉图对此未能作出科学的解释,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工资的国民差异》一章中指出:在一国范围内,是以“中等的劳动强度”(即社会必要劳动——引者)作为价值尺度的;而在世界市场上,由于**“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程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因而,**“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⑤这就是说,在国际市场上,商品价值量的决定与一国范围内商品价值量的决定是不同的。在国际市场上,由于各国的劳动生产率高低不同,生产同类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各不相同,商品的价值量不再由各国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而是由

“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即各主要生产国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国际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至于商品的价格，当然也就不是以各国的商品价值为基础，而是以国际价值为基础，围绕着国际价值上下波动。这样，在国际市场上，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便处于有利的地位；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便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各国商品的个别价值不论低于还是高于国际价值，只要贸易是以国际价值为基础，则从这个意义来说，贸易是等价的，是平等互利的。由于李嘉图不懂得在国际市场上商品的价值量是由国际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因而他就无法对上述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有的同志以李嘉图不能科学地解释上述现象为理由，就断定“比较成本说”“在根本上违背了他自己提出的劳动价值论”，并把李嘉图所假设的葡萄牙能用耗费八十个人劳动一年生产的葡萄酒同英国用耗费一百个人劳动一年生产的毛呢相交换说成是不等价交换。^⑥我认为这是缺乏根据的。要知道，李嘉图在这里所研究的，不是某一笔具体交易，而是从大量的国际贸易现象中概括出来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只是未能作出科学的解释罢了。如果说这是不等价交换，那末，在国际市场上，商品交换的比例能以个别国家的商品价值为基础吗？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是根本不会出现的。

当然，我这样说，绝不是否认国际贸易中存在不等价交换和国际剥削。事实上，在国际贸易中，不等价交换是经常存在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它是由供求关系的不平衡所引起的，它的出现是正常的。从这方面看，就要求我们好好学会做生意。另一种，是资产阶级利用欺诈、暴力和垄断所造成的，这种不等价交换是不正常的。后一种不等价交换，早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就已出现，到了帝国主义时期变得更为突出。对于这种不等价交换，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但是我们在斗争中应该讲究策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而且还要同资本主义国家继续做生意。关于这一点，李嘉图囿于资产阶级的偏见和历史局限性，他不仅把资本主义看成是自然的和永恒的社会形态，而且把当时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也看成是自然的和永恒的，根本看不到国际贸易中所存在的这种剥削现象。因此，这也就成了李嘉图“比较成本说”中的一个错误。

总之，我认为，对于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首先要肯定它含有科学的成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的联系；但是，也要看到它有着严重的缺陷。因此，我们应该批判地加以吸收，借以改进和加强我国的对外贸易工作，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注：①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8—30页。

②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七章

《论对外贸易》，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08—126页。

③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5页。

④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手稿之一《货币论》，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7页。

⑤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4页。

⑥王怀宁：《资本主义国际贸易与金融》，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第36—37页。